

19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灾害文学研究

张琳*

目 录

1. 绪论
2. 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灾害文学的主旋律—苦难叙事
3. 政治意识形态对灾害书写的影响
 - 1) 批判社会的同时回避阶级对抗
 - 2) 城乡二元对立的消解
 - 3) 上等灾民—农村地主与城市知识分子
4. 结语

中文摘要

19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的灾害文学以苦难叙事为主旋律，反映了人民在自然灾害肆虐下痛苦不堪的社会现实，抨击了政府赈灾不利，官僚腐败无能，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社会阴暗面。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使右翼文学的灾害书写呈现出一些与其他派别不同的面貌。右翼作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灾害中出现的人祸因素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同时回避了阶级对抗问题。赛珍珠塑造了独特的灾民和市民形象试图消解左翼文学灾害书写中常见的城乡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作家靳以和右翼文人龚一波同时关注水灾中的有产阶级，前者用写意的笔法含蓄地呼应了左翼文学的阶级对立主题，后者则试图以富人的见义勇为和同情心打消阶级壁垒。

关键词: 右翼文学 灾害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1930年代文学 现代文学灾害书写

* 용인대학교 용오름대학 부교수

1. 绪论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地形复杂的大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民国时期更是多灾多难。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民国时期对各种灾害的科学记录更加详尽，统计数据也愈加惊人。根据夏明方的统计，在1912~1948年的37年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次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年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属于灾区。像1928、1929这样灾害频发的年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¹⁾仅在1926年至1937年间，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之多，不计在内的地区性中小灾害更多。最为严重的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这几次大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都是极为骇人的。²⁾通讯技术和报业日渐发达的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人民能通过详实的图文记录实时了解到惨重的灾情。灾害不仅给灾区带来深重苦难，在非灾区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作家们或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有感而发，创作了大量灾害题材的文学作品。

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现当代文学中的以灾害为主要创作题材的灾害文学³⁾，成果突出的有张堂会和周惠两位学者。张堂会关注此领域已达20年之久，其研究范围从民国开始一直论述到当下，他的著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⁴⁾与《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⁵⁾探究了自然灾害对人

-
- 1)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5~37页参考。
 - 2) 赵兴胜 高纯淑 徐畅 杨明哲 著，《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张宪文，张玉法 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8-459页参考。
 - 3) 学界对以灾害为主要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命名十分多样，有“苦难文学”、“灾难文学”、“灾荒文学”、“灾异文学”、“创伤文学”等提法。随着研究的深入，2010年以后，“灾害文学”的提法越来越普遍，大量文章开始使用“灾害文学”这一理论话语开展学术研究，关于灾害文学的定义也在学者的研究实践中日益规范成型。张静，《“灾害文学”的理论话语：形成、发展与开拓》，《天中学刊》，第38卷第4期，2023.8，第109页参考。
 - 4) 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5) 张堂会，《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灾害书写的立体化图景。周惠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从文学转型的角度，凸显了现代文学灾害书写在文学观念，文学体式等方面的新变，对灾害文学的主题进行了归纳与透析，力图探求造成灾害文学艺术缺失的原因。

相较而言，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90年代以后的灾害文学作品受到的关注较多。特别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灾害书写是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有《责任与偏向—论20世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⁶⁾、《灾荒饥谨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⁷⁾、《现代小说灾害叙事中的左翼话语》⁸⁾等，这些研究从叙事模式、主题内涵、表现形式和艺术缺陷等方面探究了1930年代自然灾害书写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左翼革命的批判精神和阶级意识深刻影响了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

19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⁹⁾上也刊登了不少以自然灾害为创作题材的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建国以来文学史上的1930年代几乎没有右翼文学的痕迹。新时期以后，学界呼吁真实客观地还原文学场复杂的面貌，又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新概念，右翼文学才陆续进入研究视野。本稿以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右翼期刊上刊登的4篇自然灾害主题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右翼文学灾害书写的面貌，并通过与左翼文学和政治倾向不明显的自由主义文学的灾害书写进行对照，探寻右翼文学灾害书写的特征。

6) 贺仲明，《责任与偏向—论20世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人文杂志》2008年第3期。

7) 张堂会，《灾荒饥谨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5卷 第3期，2016.5。

8) 周惠，《现代小说灾害叙事中的左翼话语》，《现代小说批评》，2019年第3期。

9) 本稿对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的选定标准为曾经明确表示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并对该运动的理论建设或文学创作有所贡献的期刊。期刊的投稿人大多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右翼人士，但鉴于1930年代文学场的复杂面貌，也有一些没有鲜明政治立场的自由主义作家，甚至有极少数左翼作家。右翼杂志的投稿人既有专业作家，也有政府机关文职人员，大中学的师生等无名业余作家。本稿选定的四篇小说的作者，赛珍珠是著名作家，陈福熙也有据可考，何心只有一行介绍，龚一波则未能找到相关介绍。

2. 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灾害文学的主旋律—苦难叙事

张堂会是这样定义灾害文学的：“‘灾害文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产物，是以表现洪水、干旱、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现象为主要内容并能够传达出一定灾害意识的文学作品。”¹⁰⁾他认为“灾害文学”并不是“灾害”和“文学”之间的简单相加，“灾害意识”，即人们对灾害现象的主观反应，是判断“灾害文学”的核心因素。苦难叙事是灾害文学书写的主要模式。¹¹⁾本稿以此为基准，选取了四篇以自然灾害为背景，描写灾民的悲惨遭遇，记录时人对灾害现象主观反映的小说。其中两篇是以旱灾为背景的同名小说，分别是发表在《国民文学》¹²⁾第1卷第1期的《旱》，作者何心¹³⁾；《国民文学》第1卷第5期和第6期的《旱》，作者陈福熙¹⁴⁾。另外两篇以水灾为背景，分别是发表在《矛盾月刊》¹⁵⁾第2卷第2期的《洪水》，作者署名美·布克夫人，即赛珍珠¹⁶⁾，译者为

10) 张堂会，《论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于文化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第48页。

11) 张堂会，《作为方法的“灾害文学”-百年来中国灾害文学的内涵、表征与特质》，《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第204-209页参考。

12) 《国民文学》，月刊，1934年10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7月15日停刊，发行至第2卷第4辑。国民文学月刊社编辑，汗血书店发行。

13) 关于何心的介绍，只在《国民文学》第1卷第2期《本刊第一二期执笔人介绍》中找到一行，“何心女士，即丁丁夫人。想读者中早有人读过她的文章了。”丁丁，被《国民文学》称为老作家，曾任某县县长，清乡干部学校教育长，兼任党部要职，曾自费主办《作家》杂志。

14) 陈福熙曾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后任杭州《国民新闻报》新文艺副刊编辑。在《旱》的结尾处，作者注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于真如暨大”，即暨南大学上海真如校址。1930年代初的上海暨南大学名师云集，如夏丏尊、曹聚仁、梁实秋、叶公超、傅斯年、沈从文等都执教于斯。学生中也人才济济，出了一批学生作家，除了陈福熙，还有小说家何家魏，以及后来在香港成名的彭成慧，在南洋成名的黑婴、温梓川等。陈福熙写过《浮云集》、《春之烦恼》等几部散文和小说集。内容大多为恋爱故事。许定铭，《陈福熙的烦恼》，《大公报》2009.11.23，C4版参考。

15) 《矛盾月刊》，月刊，1932年4月20日创刊于南京，1934年6月1日停刊，发行至第3卷第4辑。矛盾出版社编辑部编辑，矛盾出版社发行。

16) 赛珍珠 (1892~1973)，著名美国旅华作家。出生3个月时同父母亲一同来到中国，除了短暂回美国求学，她一直在中国生活到1934年。1921年与丈夫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一

庄心在；发表在《奔涛》¹⁷⁾第1卷第10期的《水灾》，作者龚一波。

何心的《旱》篇幅短小，讲述了旱情形成初期，自耕农志成家和雇农阿土家艰难对抗灾荒的情形。陈福熙的《旱》同样以旱灾为背景，以主人公老六堂一家为中心，叙述了沈家村的村民们从灾情初现，到成灾后不断拼死挣扎，谋求生路的过程。赛珍珠的《洪水》原文是英文，由庄心在翻译成中文。译者在序文中介绍到1931年扬子江发生水灾，布克夫人为了募集善款写了5篇速写，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并在美国的电台广播，由此在美国筹得20万金圆的救灾款。现在黄河长江水患叠起叠来，特从中择选3篇译出。这三篇速写的小标题分别为《荒脊的春天》、《灾鸿》和《父亲和母亲》。《荒脊的春天》讲述了洪水过后，农夫刘在熬过冬日的饥荒，终于迎来了春天，却苦于没有种子下种。

《灾鸿》讲述一对逃荒的祖孙，爷爷用好心人施舍的钱，只给孙子买了一小碗面充饥，自己宁可继续饿着肚子，也要留下钱买种子。《父亲和母亲》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五个幼小的孩子被困在洪水中的一小块高地上，虽然母亲不眠不休地照看孩子。父亲还是趁妻子困倦睡着时丢弃了两个孩子。龚一波的《水灾》以地主家少爷的视角记录了洪水中的各种惨状，以及自己去救人的经历。

与其他派别一样，苦难叙事也是右翼作家灾难书写的主旋律。

面对天灾，有的人慑于天威，或者听天由命，意志消沉，或者寄希望于迷信；但也有的人不愿意坐以待毙，努力自救。即使明知希望渺茫，也要拼命保住庄稼和财产。何心的《旱》中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志成还差一年就可以毕业，因为旱情导致家庭经济破产，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农村的他一边自修一边帮助父亲抗旱。正午的烈日下，他让精疲力尽的妹妹和父亲去树荫下休息，自己仍然在田中锄地。尽管明知道不下雨就不能下种，这石头一般坚硬的泥土锄了也没有用，他仍然没有放弃。

陈福熙的《旱》中老六堂作为一家之主，带领儿孙在河边日以继夜地车

起迁居南京后，在金陵大学教授英语文学。1930年开始写作事业。1931年，其著名小说《大地》问世，这部杰作使她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后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7) 《奔涛》半月刊，1937年3月1日创刊于武汉，1937年7月16日停刊，发行至第10辑。奔涛半月刊社编辑，华中图书公司发行。

水，妄图救下即将枯萎的秧苗。年纪不过五十多岁的老六堂因为操劳过度，瘦得如同骷髅，却连续车了三个昼夜。尽管全家人拼尽全力，旱情却日益严重，近处的河水已经完全车干，也没有钱雇人车远处的水，因为镇上的财主看到旱灾已成定局，不肯借钱给农民。老六堂和乡邻们在饥饿与疲倦中拼命车水，却仍旧只能眼睁睁看着田土干裂，秧苗枯萎。

徒劳无功的灾前自救说明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终究是渺小无助的。然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当真正的灾害来袭时，人类更是毫无抵抗之力，只能任凭洪水卷走生命与财产，对旱灾造成的饥荒也束手无策。右翼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记录着灾害肆虐下，民众苦不堪言的悲惨遭遇。

龚一波的《水灾》描写了灾民们在洪水中挣扎求生和灾后尸横遍野的惨状。洪峰到来时，一堆人骑在一个漂浮的屋脊上由远而近，救命的呼声震耳，然而还等周围人反应过来，急流已经将他们带走，惨痛的呼声也消沉于水波中。邻人的屋子被洪水冲倒，一声声惨叫声听得很清楚，“我”家的仆人和其他试图去救人的船只都被急流阻拦在中途，根本不得靠近，转瞬间那呼救声就沉到水底。水中漂浮的尸体更是形状恐怖，被水冲掉了衣裳，一丝不挂的尸体呈乌黑色，如死青蛙似的浮在水面上，令见者忍不住连连作呕。水势稍退后，一片汪洋之上到处漂浮着直挺挺的死牛、死猪和死尸。小说结尾处，洪水退去，一群人围观着刚刚打捞上来的两具尸体，一对母子都已是半裸状态，鼓着状如气球的肚子，在水中泡得肿胀的脸光滑得吓人，但却紧紧相拥，好像成了一体。其惨状与深切的母子之情令围观者无不唏嘘。

洪水和干旱不只是瞬间的肆虐，灾害之后的饥荒才更为可怕。赛珍珠的《洪水·贫瘠的春天》讲述了农民刘为了熬过饥荒，卖掉了院子里的树，杀死了他视为兄弟的牛，木质的农具也都被当做燃料烧掉。倾尽所有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幼小的子女和衰老的双亲相继饿死。他和妻子生吞活剥池塘里的生虾，虽然勉强延续了生命，却患上了永不痊愈的痢疾。在大地回春的时节，失去一切的刘甚至愿意用双手来耕耘，可是种子早已被吃掉，空空的土地预示着毫无希望的未来。

灾害面前，人性也在接受无情地拷问。张堂会指出：“苦难最能考验人性的真面目，灾荒往往会造成人类的基本伦理规范失衡，导致人性发生畸变。”¹⁸⁾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灾民为了活下去变得冷漠无情，对别人，甚至是亲人的苦难和生命都漠然视之。《洪水·贫瘠的春天》中为了饿死的老母身上的破衣，刘与妻子爆发了争吵，妻子要将这身破衣留给孩子们穿，刘却不忍心看着老母赤身裸体地下葬。然而最终他只能妥协，让母亲仅仅穿着褴褛的内衣裤躺进了冰冷的泥穴里。

死去的亲人已经顾不上他们的体面，甚至活着的亲人，也要衡量利弊，决定去留。陈福熙的《旱》中说到灾年农家的孩子如果年纪大些，强壮些，可以帮忙干活的尚有活路，年纪小的就被看做累赘，往往是被牺牲的对象了。老六堂的儿媳阿大嫂为了车水，把刚满月的毛头整天关在茅屋里，任他嚎啕大哭。好心的邻居来叫她回去看看孩子，她嘴里答应着，脚却依旧在水车上。好不容易回到家，毛头虽然被妈妈抱着，但干瘪的乳房根本吸不出奶水，他哇哇哭闹，却遭到妈妈的打骂。可以预想，这个孱弱的小生命很难存活下来。

《洪水·父亲和母亲》中父亲为了节省有限的食粮，狠心杀死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做母亲的早已有不祥的预感，白天她把两个小的挂在胸前，抱在臂弯，眼睛时时盯着另外三个能动的孩子。黑夜她根本不敢沉睡，每晚都从瞌睡中惊醒一二十次，确定五个孩子都还在。每当丈夫稍有动静，她就高声质问他要做什么。终于有一天，母亲在饥饿和困倦中沉沉睡去，醒来后发现丈夫果然丢弃了两个孩子。父亲在洪水到来之前也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农民，他简朴勤劳，靠着辛勤耕作，把孩子们喂得很健壮。被困在洪水中，他看到妻子把仅剩的一点麦粉，都给了自己和孩子时，也叫喊着大家都得活着，强迫妻子也吃一些。然而，面对始终不退去的洪水，和几乎见底的存粮，他舍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虽然丢掉孩子后，他在黑暗中发出吼叫般的沉重叹息，在沉默中留下了绝望的泪水。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做出如此残忍的选择。

自然灾害的受害者，首当其冲是农村的农民，然而城镇也不是安全的乐

18) 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第240页。

土。龚一波的《水灾》描述了洪水淹城的惨状。在城里上学的两个弟弟在校长的带领下爬上城墙躲避洪水。城墙上人山人海，挤满了来观水的人。学生们无忧无虑地眺望水头，笑嘻嘻地像是在迎接它的到来，待到洪水伴随着暴风雨呼啸而来，直接冲破了一块城墙，席卷着站在那处的人涌进城镇，才收起了顽皮的笑容，惶恐地再也不敢乱动，天亮后，城里如浮萍般浮起了密密麻麻的尸体，更让学生感到震惊和后怕。洪水退去后，才看清城墙决口之处，一里多长的街市，百多家店铺都被水冲得精光，只留下深深一坑冷水。洪水不会区分城市和乡村，能冲倒的都冲倒，能卷走的都卷走。

除了直接受害，农村日益破产又间接影响到城镇。城镇的经济实则依托农民的购买力，丰年农民来消费，城镇才能充满活力；灾年农民无力购买，店铺生意萧条，只能破产。陈福熙的《旱》描述了市面上茶馆酒店，布店衣铺，杂货店无不冷清，只有当铺生意兴隆，然而抵押物却只进不出，终不能长久维系。城镇工商业的凋敝，不仅是店铺萧条，工厂也减产，停产，这对本就举步维艰的民族工商业造成重大打击，继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创伤。

3. 政治意识形态对灾害书写的影响

1930年代，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和右翼民族主义文艺作家都创作了灾害文学，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使他们的灾害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将三者加以对照比较，可以发现右翼文学灾害书写的特征。

1) 批判社会的同时回避阶级对抗

1930年代以丁玲的《水》、欧阳山的《崩决》、鲁彦的《岔路》、田汉的《洪水》、《旱灾》等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灾害书写，将自然灾害与阶级压迫联

系起来，突出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农民的阶级觉醒与奋起反抗。特别是丁玲的《水》前半部分生动描写了人与自然抗争的紧张过程，后半部分表现了灾民在绝望中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丁玲后来谈到这部转型之作时说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¹⁹⁾这篇作品备受左翼文坛的推崇，冯雪峰认为“《水》的最高的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²⁰⁾茅盾也盛赞：“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²¹⁾左翼批评家对《水》的高度赞誉，无疑是出于对文学创作的政治诉求和审美期待。

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它在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及文化统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直受到左翼文学阵营和自由主义文艺阵营的强烈批判。在奉左翼文学为圭臬的文学史上，民族主义文艺的长期缺席使不少人甚至误解民族主义文艺右翼期刊上刊登的作品不是赞扬国民政府政绩，歌颂国民党伟大领袖，就是诋毁共产党。事实上，这类极端的作品极其少见。民族主义文艺期刊的创作题材主要有民族历史、反帝斗争和批判社会黑暗面等。例如揭露国民政府政策失败或施政过程中的暴行，讽刺党政官僚腐败无能的作品比比皆是。²²⁾

何心的《旱》与陈福熙的《旱》两篇作品均对政府救灾不利提出了批判。

何心的《旱》中雇农阿土的妻子因为家中断粮三天，厚着脸皮又到自耕农志成家借粮。中学生志成安慰她十天前在镇上看到报纸上说：政府方面已经在积极筹集救灾的粮款，想来不久便可得到救济。阿土妻反驳这话很远呀，我们是不能扎了喉咙等候的呀。志成还试图继续说服阿土妻，说只要最近大家想办

19)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八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参考。

20)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2卷1期，1932.1。

21)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2号，1933.7.15。

22) 张琳，《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136页参考。

法捱过去，将来雨下了，救款到了，便能活下去。最终还是志成的母亲实在不忍心，虽然自己家马上也要断粮，仍然在舍不得却又不得不的尴尬情绪下，借给了阿土妻一升麦。直到小说结尾，政府的赈灾粮款仍然遥遥无期。作者用纯真善良的中学生与农妇的对话，隐晦地讽刺尚有一口饭吃的知识阶层不知底层灾民的痛苦，同时也在暗暗谴责政府救灾不利，只有报纸上抚慰人心的空话，灾民们并没能及时得到救助。

相比何心隐晦地表达方式，陈福熙则赤裸裸地揭露了所谓政府赈灾的欺骗性。陈福熙的《旱》中村民们得知知县老爷要来村里勘察灾情，无不心绪激动。年轻人热烈地期待着一睹民国时代知县的风貌。见识多的老六堂并不关心知县老爷的模样，他期待的是知县勘察后，或许有赈灾米发放。而他的邻人更是认定知县老爷一来，田租都可以不用还了。村民们翘首期盼了一整天，知县却迟迟不至。原来他带了兵，坐了轿，先到镇上楼三爷家里吃了酒，打了八圈麻将，一看时间已晚，便打道回府了。失望的村民们都不敢指望知县老爷会第二次下乡，更不敢去奢望什么赈灾米和免田租了。

而更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至，豪绅地主与米商相互勾结，乘机哄抬米价。老六堂眼看着家中就要断粮，不得已去镇上向胡老爷贷粮。可是不仅要抵押品和店家担保，而且借三斗，明年秋收就要还九斗上等米。面对苛刻的借贷条件，脾气温和的老六堂用烟管粗野地敲着桌子，悲愤地朝家人哀嚎：“大家死了吧，干干净净！这年头怎么还活得下去，穷人不是人。”²³⁾

报纸上天天登着各种惨闻，全家一起服毒自尽的，把亲生女儿卖到妓院的，背井离乡去外乡乞食的，更有流民结队抢米，吃富户的。政府和各地民间纷纷组织赈灾委员会，每天派人去乡下调查灾况，仍等不来半粒赈灾米。却等来了县政府发令征缴本年的钱粮。作者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典衣不值银，卖人无人要，米价飞涨，赈灾委员落腰包，县政府勒令徵钱粮。”²⁴⁾

沈家村的村民们在饥饿中熬过两三天后，就集合了附近几个村落的饥民一

23) 陈福熙，《旱》，《国民文学》第1卷第6期，第53页。

24) 陈福熙，《旱》，第54页。

起踏上了去县城告荒的征程。他们憧憬着知县老爷能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然而好不容易走到县衙门口，这里已经被告荒的灾民挤得水泄不通。惶恐的县长加派了兵把守县衙。等了很久以后，穿着体面的县长才在一排手枪卫队的保护下出现，只简短地告知灾民，灾情已经上报到省里，等消息吧，就匆忙躲进县衙。当灾民们再次骚动起来时，荷枪实弹的警察、保卫团、商团陆续出现，将他们驱逐到城外。

陈福熙指出造成灾情的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他对政府赈灾不利，无视灾情强行征缴钱粮，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社会阴暗面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通过对比，我们也可以发现，何心与陈福熙两位作者即使同处于右翼阵营，对政府的批判力度也不同。陈福熙的《旱》可以说其力度并不亚于左翼作家的作品。但是将这篇小说的结尾与丁玲的《水》的结尾加以对比，仍然可以看出右翼作家和左翼作家不同的政治立场。

《旱》的结尾是“饥饿的群被压出了城外。天渐渐黑下来了，天空中掠着归巢的鸟，但这批被逐的流亡者，他们丢了茅舍，丢了一些仅有的财产，只有哭哭啼啼的，转往县东的干窑镇去。”²⁵⁾灾民们在县城告荒，被驱逐。回家乡，死路一条。只能抱着渺茫的希望去另一个城镇，幻想能在那里得到救助。

丁玲的《水》结局也是饥饿的灾民奔向城镇，“于是天将蒙蒙亮的时候，这堆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了过去。”²⁶⁾这是饥寒交迫的灾民在希望层层破灭后，终于认清了剥削阶级的真面目，意识到反抗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扑向城镇不是期待政府或者民间的救助，而是抢回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米粮。

陈福熙作为右翼作家即使对政府进行犀利的批判，也不可能触碰反抗政府的红线。因此作品的结尾只能止于灾民去他地另寻出路。右翼作家基于自身政治立场只能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回避阶级对抗。

25) 陈福熙，《旱》，第56页。

26) 丁玲，《水》，《丁玲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6页。

2) 城乡二元对立的消解

当饥荒到来，农民再也无法在农村找到食物，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踏上乞食的流民之路。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有丰富的食物来源，有多样的谋生渠道，又是政府机关和社会慈善团体的所在地，进城是灾民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毫无疑问，灾民的流入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经济、治安、卫生都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些来自农村的流民并没有谋生的本领和技能，有点力气的还可以做车夫或帮佣，更多人则沦为乞丐、妓女、流氓和小偷。流民穿着褴褛，身体脏臭，是城市居民厌恶和鄙视的对象。受灾的家乡已经回不去，冷漠的城市也不愿接纳他们，在自然灾害和人性荒漠的双重打击下他们默默地在城市的最低层苟延残喘。文学史家刘心皇²⁷⁾在《大华晨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写出了流民在城市里的不幸遭遇，作者一面对他们深表同情，一面替他们发出了不平的怒吼。

《水灾》²⁸⁾描写了洪水泛滥，灾民们只有逃往他乡，“在他乡仰仗救济，救济，救济，叫嚷得震天价响，事实上颇有望梅的叹息，只有在乞讨中残喘。”控诉了灾民在他乡根本得不到救济，只能沦为乞丐。《乞丐》²⁹⁾写了一个乞丐受尽冷眼与讥笑，他质问：“同是一样的人，我为何要向人乞怜？”虽然不甘心遭人冷眼，却因为饥饿的胃，挺不起腰杆。最后他在幻想中“忽然笑了起来，我想起

27) 刘心皇远在高小毕业前夕，因为受到左倾的国文教员周茨平的影响，就热衷于收集左翼作品。十六岁在叶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写热情澎湃的左翼诗歌。1932年左翼作家联盟河南分会在开封秘密成立，刘心皇因年纪小未能参加，但他的作品充满着普罗意识。曾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经国民党的郑心鲁校长劝阻，他以俄国的高尔基及中国的鲁迅均未入党婉拒。刘心皇曾任叶县参议员、教育馆长、师范校长、农会理事长、河南省农工运动委员会副主委、河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于1934年3月在叶县创办《艺秋》月刊，1935年初负责国民党陇海铁路党部办的郑州《大华晨报》副刊《中原文艺》和《新诗世纪》，发表了许多鼓舞全国军民抗敌救国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古远清，《刘心皇和他的新文学史及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第61页参考。

28) 刘心皇，《水灾》，《大华晨报》（郑州）副刊《中原文艺》第4卷第8期，1936.3.28。

29) 刘心皇，《乞丐》，《大华晨报》（郑州）副刊《沙漠诗风》第18期，1936.5.15。

终于有一天会变天！”刘心皇还写了两首《车夫》³⁰⁾，描写了在城市中靠拉车谋生的流民。《车夫(一)》描写了一位被洪水湮没了家园的少年，在陌生的城市里，不愿与老人一起乞讨，租来人力车靠力气吃饭。晚上睡在车斗里的少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坐在车上。《车夫(二)》通过艳阳下汗流满面，大雨中被浇透的拉车人与耀武扬威的坐车人形成的对立，揭示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车夫想着“都是人，为啥不平等？”又希望迎面打来的雨水，能“冲去人间的不平等。”

在左翼灾害文学中这种城市居民与流民的对立经常出现。周惠指出“城市对于灾民的漠视并非因其自身难保而无暇顾及，实则是私利熏心、道德短视的表现，昭示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的地位不对等，城乡对立也成为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直接根源。”³¹⁾城乡二元对立也是左翼阶级话语的需要，城市作为“恶”的存在，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善”的流民则是被剥削者，是觉醒后推翻阶级压迫的中坚力量。

赛珍珠则力图消解这种城乡二元对立。《洪水·灾鸿》描写了城市里的市民面对成千上万源源不断涌入的灾民，日渐恐慌。商户和住家的门口都围着乞食的灾民，呵斥也无法驱散。市民们抱怨再这样布施下去，自己也要挨饿了。黄包车夫对来抢饭碗的灾民更是恨之入骨。但在恐慌和厌恶的同时，城市里依然有人对灾民抱有同情和怜悯。夕阳下，蹒跚走在流民队伍最后的老人再也走不动，颓败地放下担子，闭着眼在路边残喘，一位路人看到这一幕，一边赌咒今天再也没有余力帮助别人；一边又联想到已经去世的父亲，最终他还是从破碎的腰带里摸出了明天的饭钱，一番踌躇后，又添了一点零钱。

让人诧异的是老人的反应，他甚至没有伸出手去接钱，反而说“先生，我并未求你。”他强调家乡有很好的土地，以前从没有挨过饿。洪水使他们失去了一切，耐不住饥饿的年轻人，连种子也吃掉了。他用零钱给睡在担子里奄奄一息孙子买了一小碗面条，自己仅仅舔了舔碗。面条摊主很诧异他为什么不用剩下

30) 刘心皇，《车夫》，《大华晨报》（郑州）副刊《沙漠诗风》第9期，1936.3.13。

31) 周惠，《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3期 第40页，2015.3。

的钱再买一些吃。老人说那是要购买种子的，有土地的话，就会知道，一定要播种，否则明年还是荒年。在这里，赛珍珠沿袭了她的成名作《大地》的主题，表现了农民对土地深沉的热爱，对耕种的执着。这位老人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作为一个有土地的农民，他不愿意将自己贬低成乞丐，自尊让他坚信灾难只是一时的，只要在土地里播下种子，土地就会给与回报，孙子就能得救。即使自己死了，别人也会继续耕种。作者还两次提到老人所在的这一队流民虽然面色饥黄，身上的衣服和逃荒担子里的被褥器具却干净整洁，因为他们都曾经是体面的农人，如果不是灾荒，他们不会背井离乡。

赛珍珠笔下的城市虽然没有宽容友好地接纳所有的灾民，但部分市民的怜悯和同情也体现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面黄肌瘦却干净整洁的灾民，靠着对土地的热爱和信赖，维持着最后的尊严和希望。

由于赛珍珠旅华美国人的特殊身份和英文写作的原因，她和她的作品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叶公超称赞她：“忠实的刻画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³²⁾左联成员祝秀侠却严厉地批评她：“一位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道士的女儿，她站在她的基督教徒的立场上，不能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正确深入的观察和切实的体验，仅能零碎地平面地去了解一般事务，也零碎地平面地把它诉说出来。”³³⁾祝秀侠的观点代表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文人对赛珍珠的厌恶感，既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因为赛珍珠小说中帝国主义侵略的缺席使他们感到不满。也有评论者肯定了赛珍珠对中国真挚的同情态度。例如本文的译者庄心在就认为：“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是应当感谢的。”³⁴⁾

赛珍珠创作《洪水》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美国本土国民的同情，帮助中国灾

32) 叶公超，《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6页。

33) 祝秀侠，《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本写给高等白种人的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同上，第54页。

34) 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矛盾月刊》第2卷第1期，第85页。

民筹集善款。在赛珍珠的努力下，1931年在国际社会为中国水灾的捐款中，美国人的捐赠占了绝大部分。美国红十字会还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赛珍珠，说正是她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才使那么多美国人慷慨解囊。为了迎合美国读者，使作品更符合西方和基督教宣扬的博爱、平等的价值观，她的笔法可能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她独树一帜的作品消解了灾难文学中常见的城乡二元对立，淡化阶级矛盾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悲凉的文学风格与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3) 上等灾民-农村地主与城市知识分子

与左翼作家集中关注灾害中的底层农民不同，右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同时也关注了社会上层人士在灾害中的经历以及主观反应。

京派作家靳以在1930年代写了一篇以黄河决堤水灾泛滥为背景的小说《人间人》³⁵⁾，描写了留洋归来的大学教授刘文涵夫妇暑假到山上的别墅度假。连日阴雨，在以雨景闻名的山中，刘教授尽情玩赏山水云烟，觉得没有哪年的夏天会这样好。报纸上特号字登着洪水的新闻，刘教授对灾情毫不关心，还自私地表示赈灾自己是一文钱也不会捐。仆人的家乡被淹了，他觉得水头只有七八尺，不会淹到二楼，顶有点不方便而已。刘太太惊诧于仆人家乡居然没有楼房，又觉得不妨事，躲在屋顶上，等两三天，自然会有人来救。她并不知道茅草房是禁不住洪水冲击的。仆人因为水灾悲痛得在主人面前流泪，刘教授夫妇却颇有闲情逸致地观赏如米芾山水画般的雨景，舒适地坐在沙发里喝咖啡，想着世界上没有大不了的事，即使有二十丈高的洪水冲了来，也不能沾湿他们的鞋底。对美有着高超鉴赏能力的大知识分子并不能体会仆人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在同一个人间，身处不同阶级的人却如此泾渭分明。然而当刘教授得知因为山洪暴发，交通和通讯都要中断两个星期时，他方寸大乱，因为如果不能及时赶回去为校长太太祝寿，适时送上500元寿礼的话，自己主任的职位恐怕不保，也许连个教授也当不成。眼前的美景顿时没有了诗意，在现实的危机面

35) 靳以，《人间人》，《珠落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

前，道貌岸然的刘教授终于露出了追名逐利之徒的庸俗真面目。

作家靳以遵循了京派小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淡化情节，渲染气氛，以优雅闲适的笔调描写了山雨朦胧的美景和上层人士优越诗意的生活，含蓄却辛辣地讽刺了上流社会知识分子不知民间疾苦，对灾情无动于衷，只顾钻营逐利的自私和虚伪。虽然没有激进的革命字眼和阶级对抗，却以写意的方式呼应了左翼文学的阶级对立和社会批判主题。

龚一波《水灾》描写了一户农村地主家庭在洪水中自保以及救人的经历。前年的水灾中，原有的房屋因为地势低，虽是楼房也被洪水冲毁了。幸好全家都上了船才保住性命。灾后父亲加高地基，重新盖了坚固的楼房。洪水即将到来时，全家人都上了楼，佣人们在楼下奔忙，将家具牲口都收拾好。狂风暴雨与洪水呼啸而至，屋宇倒塌声和呼救声揪人心肺，全家虽然安然无恙，却在焦灼与凄凉中寝食难安。天亮后，目睹着洪流中灾民的惨状，三个青壮年齐心协力驾驭小船，终于救下攀在树枝上奄奄一息的赵木匠。水势平稳后，急忙去接城里上学的两个弟弟，中途得知学校已经用船把学生们都送回了家。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全家把酒言欢。祖父一边庆幸洪水中还能阖家团圆，一边又为洪水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乡邻难过不已。

小说中的“我”出场时还是一个胆小怯弱，不知人间疾苦的富家少爷，甚至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时，仍贪恋着在楼上观看这非常的情势。若不是惧怕父亲发怒，还不愿同仆人一起收拾楼下的东西。水刚盖过腿，“我”又因为禁不起冷水的淹浸，便先奔上楼，抱着小侄儿靠着栏杆看仆人们在水里奔忙。然而面对骇人的灾情，看到美丽的家园变成一片汪洋，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水底，形状恐怖的尸体漂浮在水面，“我”也迅速成长，积极主动参与救助乡邻，迫不及待要去接生死未卜的弟弟。

相对其他三篇研究对象作品，《水灾》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右翼文学，作者试图消除阶级对立的努力非常明显。还通过祖父的话蜻蜓点水般批判了一下共产主义革命。“这些年来，不是扯起红旗的军队来杀害你，便是火焰一般的旱灾来干死你，或是张牙舞爪的蛟水来淹没你，可怜乡居的人们啊，个个都受冻

挨饿的长得像个骷髅，唉……”³⁶⁾作者将共产主义革命视为与洪水旱灾并立的灾祸，但关于所谓的“红祸”，作者也就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展开叙述。右翼期刊的作品中以抨击共产主义革命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反倒是像《水灾》这样稍加提及的情况比较常见。

《水灾》的作者以有产者的视角，记录了洪水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肯定了富家少爷见义勇为，祖父同情乡邻的博爱精神。本意是展现水灾残酷的同时打消阶级壁垒，然而字里行间透露着资产阶级的优越感，在尸横遍野的灾荒中庆祝一家团圆，把酒言欢，更显得不合时宜，令人反感。龚一波作为无名作者本身写作技巧不成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深入观察底层社会，认识到洪水给底层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

如果说左翼文学力求表现尖锐的阶级对抗，京派作家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含蓄地揭示阶级差距，那么《水灾》这样的右翼文学则旨在完全抹去阶级的界限。灾害面前只有灾民。落水的亡魂，失去家园的难民可怜可叹，做好充分防灾抗灾准备的地主阶级也并不冷酷无情。他们真切地同情落水者，积极地参与救助。右翼作家从民族主义文艺的立场将自然灾害归结为全民族的灾难，用互助和共情给灾难肆虐的人间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

4. 结语

本稿以19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文艺期刊上刊登的四篇灾害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和比较可以得知右翼灾害文学与其他流派一样，以苦难叙事为主旋律，表现了灾民们徒劳无功的灾前自救，灾害面前脆弱易逝的生命与扭曲的人性，以及从农村迅速扩散到城镇的灾害影响等等。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使右翼文学的灾害书写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面貌。右翼作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灾害中出现的人祸因素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同时回避了阶级对抗

36) 《水灾》，《奔涛》第1卷第10期，第541页。

问题。赛珍珠塑造了独特的灾民和市民形象试图消解左翼文学灾害书写中常见的城乡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作家靳以和右翼文人龚一波同时关注水灾中的有产阶级，前者用写意的笔法含蓄地呼应了左翼文学的阶级对立主题，后者则试图以富人的见义勇为和同情心打消阶级壁垒，突出了全民族都是灾害受害者。

与左翼文学直接鼓动灾民进行阶级对抗不同，右翼作家只能给予灾民深切的同情，无奈地呼吁和期待政府及民间的救助。在左翼作家的立场上，这固然是一种阶级局限性，但民族主义文艺作家通过灾害书写反映了人民在自然灾害肆虐下痛苦不堪的社会现实，抨击了政府赈灾不利，官僚腐败无能，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社会阴暗面。作为作家他们已经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作为民族主义文艺阵营的一分子，他们也用自己的笔为民族团结，民族自强贡献了一份力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重大灾害，与之相应灾害文学创作也大量出现，这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灾害文学。1930年代作为自然灾害高发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灾害文学的爆发期，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关注是持续且有深度的，遗憾的是右翼期刊的灾害文学始终不在研究范围之内。本稿重新挖掘出这些长期被忽视的作品，希望能以小窥大，重现右翼灾害文学的真实面貌，使现代灾害文学研究能更客观完整。

参考文献

- 《北斗》 第2卷 第1期 (1932.1)
- 《文艺月报》 第2号 (1933.7)
- 《国民文学》 第1卷 第1期、第2期、第5期、第6期 (1934.10~1935.5)
- 《大华晨报》(郑州) 副刊《中原文艺》第4卷 第8期, (1936.3.28)
- 《大华晨报》(郑州) 副刊《沙漠诗风》第9期(1936.3.13) 第18期 (1936.5.15)
- 《奔涛》 第1卷 第10期 (1937.7)
- 《大公报》 (2009.11.23)
- 靳以,《珠落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 丁玲,《丁玲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 丁玲,《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 张堂会,《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 赵兴胜 高纯淑 徐畅 杨明哲 著,《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张宪文,张玉法 主编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古远清,《刘心皇和他的新文学史及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
- 贺仲明,《责任与偏向—论20世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人文杂志》2008年第3期。
- 周惠,《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3期 2015.3。
- 张堂会,《论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于文化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

张堂会,《灾荒饥馑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3期,2016.5。

周惠,《现代小说灾害叙事中的左翼话语》,《现代小说批评》,2019年第3期。

张堂会,《作为方法的“灾害文学”——百年来中国灾害文学的内涵、表征与特质》,《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

张静,《“灾害文学”的理论话语:形成、发展与开拓》,《天中学刊》,第38卷第4期,2023年8月。

张琳,《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Abstract

A Study on Disaster Literature in Right-wing Nationalist Literary Journals in 1930s

Zhang Lin

In the 1930s, the disaster literature of Right-wing nationalist literary journals mainly focused on portraying the suffering endured by individuals, reflecting the unbearable social reality of people amidst the ravag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y critiqued the government's inadequate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collus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and the darker aspects of society.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also lends a distinct character to the disaster narratives within Right-wing literature, setting it apart from other factions. From a nationalist standpoint, Right-wing writers offered varying degrees of criticism towards the human factors emerging from disasters, yet they tended to avoid addressing issues of class conflict. Pearl S. Buck depicted a unique portrayal of disaster victims and citizens, aiming to challenge the common urban-rural dichotomy found in Left-wing literary disaster narratives. Liberal writer Jin Yi and Right-wing writer Gong Yibo both focused on the bourgeoisie amidst floods. While the former implicitly echoed the class conflict theme of Left-wing literature with subtle strokes, the latter attempted to break down class barriers through the bravery and compassion of the wealthy.

Key words : Right-wing literature, Disaster literatur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Movement, 1930s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isaster theme

투 고 일 : 2024. 4. 10. / 심 사 일 : 2024. 4. 15. ~ 2024.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4. 5. 20.

